

Oikos^[1] and *Oikonomika*^[2]: 现代经济的摇篮——早期现代家庭

[美] 约翰·维特^[3] 著

梅意颀^[4] 译

介绍

在西方社会， 婚姻家庭^[5] (the oikos) 和经济学 (oikonomika) 一直在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商品供给方面互相依赖， 互相紧密联系。长期以来， 婚姻家庭作为一个独立、重要的经济体， 尤其是那些拥有商店、仆人和服务的家庭， 它们依靠并为市场和货币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样， 它也一直是教育、学徒学习和职业培训的重要来源； 这些活动对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 家庭也为父母、小孩和其他亲属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和给养： 当家庭成员贫困、受伤、丧失能力、生病、年老或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有人依靠时， 家庭照顾并护理他们， 为他们提供营养， 分担他们的痛苦， 让他们免受贫困的苦难； 即使这些责任现在更多的被社会机构、专业人员和拥有现代福利制度的国家所承担。在上一代， 新的婚姻家庭形成的时期往往也是两个家庭之间财产和贸易交换的关键时期， 它为通过赠予、信托、捐赠、继承等方式将财产传递给下一代提供了基本渠道。

到现在为止， 很多文章已经讨论过现代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和官僚化对婚姻家庭的腐蚀性影响。马克思 (Marx) 和恩格斯 (Engels) 也曾经发出过严重警告： 马克思在 1867 年写道， “现代工业通过颠覆传统家庭经济基础， 松懈了传统家庭的纽带”；^[6] 恩格斯在 1884 年也曾说， “在现代工业的作用下， 无产阶级的一切家庭关系都被拆散， 他们的小孩变成了商业和劳动的简单工具。”^[7] 一代以后， 马克斯·韦伯 (Max

^[1] 古希腊语， 家、住宅， 是古希腊城邦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

^[2] 古希腊语， 来自 οἰκονόμος (oikonomos, “manager”, 管理)， 本意为家庭管理， 也译为经济学（亚里士多德曾以此为其《经济学》一书标题）。

^[3] Robert W. Woodruff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Law; McDonal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Religion;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w and Religion at Emory University.

^[4] J.D. Candidate, 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2022); B.A., St. John’s College (2019). 我们衷心感谢 Eric Wang 在翻译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 不管是在选词还是理清思路上， Eric 都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5] 婚姻家庭为 marital household, 特指夫妻结婚后产生的家庭， 而不是双方同居的家庭。

^[6] Karl Marx, *Capital*, ed. Frederick Engels, New York 1906, pp. 489.

^[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Samuel H. Beer, Wheeling, IL 1955, pp. 28;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72. Scott Yenor, *Family Politics: The Idea of Marriage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Waco, TX, 2011, pp. 137-158.

Weber) 告诫人们“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 对家庭和社会具有腐蚀性的影响。他所说的技术理性, 是指将越来越多的生活目标置于手段-目的过程(means-end procedure) 控制下的动力, 而这个手段-目的过程是最快速、最有效地实现短期利益和物质满足的方法。技术理性的逻辑是: 效率始终是达到满足人欲望的目的的最佳手段, 而人的欲望总是通过拥有更多的东西而得到最快速的满足。韦伯预言, 技术理性的逻辑最终将成为一个“铁笼子”(iron cage), 把现代社会困在对财产、权利和声望的不懈追求中; 它将逐渐使人们沦为进步“机器中的齿轮”(cogs in the machine)。进步“机器”的目的和手段则将完全脱离人的掌控。^[8]

从这个意义上说, 技术理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 它不仅体现在韦伯所展示的资本主义形式上, 也体现在约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后来所阐明的社会主义形式上。^[9]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free market capitalism), 特别是以新自由私营企业经济制度(neo-liberal economic systems of private enterprise) 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 是一种供求、成本和收益被应用于生产和传递商品、服务、体验的技术理性体系的教科书案例。同样, 以现代福利政策或以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官僚理性(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也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技术理性和这两种现代化共通的观点是: 有效运用以市场或者政府官僚为形式的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可以提高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满意度。

[10]

随着市场和国家影响力的增强, 技术理性的传播逐渐由经过时间考验的家庭、延伸家庭、地方公民社会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靠转变为对市场和国家日趋增加的依赖。它倾向于将自我价值、理想和成就的评估从地方标准转移到主要以财产、权力和声望衡量的国家和国际标准; 而且, 它往往使家庭和当地公民社会日常生活中更深层次、更持久和更具个性化的互动变得更紧张。每当技术理性开始传播, 并且人们的生活被其以效率和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 被其关于满足和幸福的定义所影响时, 家庭中健康、自由、轻松快乐的日常生活往往就会被轻视和破坏。这样一个道理经常被阐述, 包括最近的唐·布朗宁(Don Browning),^[11] 威廉·古德^[12](William Goode) 和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13]

[8]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58, pp. 181-83.

[9] 同上, pp.181;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Boston, 1987, pp. 2:333.

[10] Don Browning, *Marriage and Modernization: How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2003.

[11] 同上。

[12] William Goode, *World Changes in Divorce Patterns*, New Haven, CT 1994.

[13] Harvey Cox, *The Market as God*, Cambridge, MA 2016.

在这简短的一章中，我想探讨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即：早期现代新教家庭在塑造现代经济学价值观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早期现代新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家庭视为一个“小联邦”（little commonwealth），一个神圣的共和国里最原始的教导正义与仁慈、道德与美德、教育与福利的学校。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称婚姻家庭（marital household）为“所有世俗法律之母”；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称之为“契约社会的第一个契约”；英国神职人员（Anglican divines）将其称为“共和国神学院”。^[14] 所有这些隐喻都是为了强调早期现代新教徒的信仰，即：一个稳定而运作良好的婚姻家庭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教会、国家、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基础。早期现代新教家庭的结构和教导是为了培养其成员在经济和道德生活中有“纪律和组织”的重要习惯。在数百份布道和家庭手册（household manuals）中，它的“道德准则”详细阐述了夫妻、父母和子女、主人和仆人在不同生活阶段对彼此和对邻居的责任和权利，以及对道德和宗教的要求。正是在这里——在新教家庭的基本伦理和生活中，现代经济生活的许多基本规范和习惯慢慢地被培养、灌输、渗透在下一代的道德品质中。

本文补充和部分修正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新教精神的著名论断：帮助奠定和指导早期现代经济学的不仅仅是韦伯所认为的新教中神秘的资本主义精神，或是新教关于职业、宿命和禁欲主义的新教义的讽刺性融合，也是新教家庭在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市场道德的孵化器的直接作用。

韦伯与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

我们先来讨论韦伯的核心论点。他指出：当时最发达（或“最合理”）的经济，与新教改革运动发展最充分和最有力的地区和文化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商业领袖、资本所有者及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员工”，“绝大多数是新教徒”。^[15] 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不思悔改的功利主义和无情的贪婪）似乎与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和新教徒强调的美德相悖。然而，对韦伯来说，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并非巧合，正是新教的思想、焦虑和制度形式推动和引导了现代资本秩序的出现，取代了主宰中世纪天主教生活的传统的封建经济和教会主导的垄断。

韦伯说，三条新教教义尤其重要。首先，马丁路德的基督教职业概念（Beruf）使他那个时代的职业和精神趋于平等，并促使所有人更多地参与到辛勤工作、专业化劳动和市场经济中。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神职人员在美德和精神修养上优于俗人，连最卑微的牧师都比最高贵的皇帝更接近上帝。相比之下，路德坚持相信，牧师和僧侣并不

^[14]John Witte, Jr., *From Sacrament to Contract: Marriage, Religion, and Law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2d ed., Louisville, KY 2012.

^[15]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pp. 35.

比士兵或女仆更有道德或更接近上帝，所有人都是罪过的奴隶，都同样依靠神的恩典来拯救他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条件去追求最适合他们的天赋和地位的基督教职业；基督徒没有被要求无视世俗的世界的召唤去过一种自认为神圣的宗教禁欲主义的隐居生活，他们更多的是被要求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在平凡的工作中服侍上帝和邻居，并坚信屠夫、家庭主妇或士兵的工作与主教、方丈或牧师的一样虔诚和容易被救赎。牧师对精神的自我约束和对教会的奉献程度同样也可以被运用到世俗和物质的目的上，两者依靠信仰都有相同获得救赎的可能性。韦伯总结道：这条教义的广泛影响，“与中世纪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天职中有组织的世俗劳动的道德观和宗教观”。

[16]

其次，韦伯认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宿命论引发了宗教焦虑，促进了后来几代信徒强烈而系统的职业道德的发展；而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s）因为缺乏使天主教徒确信他们能够获得救赎的神圣恩典手段，所以急于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上帝所选中的获得永恒救赎，而不是永恒诅咒的那些人。韦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尔文主义者开始把勤奋和富有成效的劳动以及在自己职业上的成功看作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宗教责任和被上帝选中的可靠征兆。因此，他们认为，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所实行的“系统的自我控制”和纪律是为了“摆脱对天谴的恐惧的办法，而不是直接获得救赎的手段”。“加尔文主义的上帝对他的信徒们要求的不是单一的善行，而是一生系统、持久、连贯地行善。”^[17] 因此，救世神学的焦虑，培育了一种经济禁欲主义和组织，这些组织广泛地影响了经济结构。

第三，韦伯认为，正是这种逐步系统化的生活和工作的合理性，促使了新教社会摆脱中世纪晚期由教会垄断和神职人员主导的封建主义，走向了西欧和北美高度合理并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经济。信奉新教的个人和社区，在职业使命感和希望证明自己已获得上帝恩典的迫切愿望的刺激下，遵循狂热和系统的职业道德，改变了他们周围的经济风气和制度。即使那些不是新教徒，没有与新教徒同样工作激情的人，也被迫接受同样的职业道德准则，以便竞争。美国殖民地新教教派机构通过树立更严格的入会道德标准和参与圣事的礼节，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从而让大家能更广泛地参与社区经济生活的发展，^[18] 使封建传统和小规模行会逐渐让位于快速发展的现代工厂和金融。即使这种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宗教基础和象征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新教伦理和它所创造的机构仍然是人们所熟悉和认可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期的新教徒改革

[16] 同上, pp. 83.

[17] 同上, pp. 115-17.

[18]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H.H. Geertz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1946, pp. 302-22.

者试图通过提升普通人的工作以此更接近上帝，新兴经济体却将所谓的新教徒职业道德完全强制化；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变得空洞和世俗，最终成了扭曲早期新教禁欲主义的讽刺漫画。韦伯总结说，“曾经，清教徒想为他们的天职工作”，而现在：

我们被迫这样做。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进入日常生活，并开始支配世俗道德时，它已经帮助建立了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现在，这种秩序受到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约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了那些直接与经济获利有关的、所有出生在这一机制中的人的生活。这样一种情况至少在最后一吨化石煤被燃烧之前是这样的。在巴克斯特（Baxter）看来，获取身外之物的愿望应该“像一件可以随时扔掉的轻便斗篷”一样被披在“圣人的肩膀上”；但命运注定这个斗篷会变成一个铁笼子。^[19]

韦伯在这篇著名的“铁笼子”文章中提到的“巴克斯特”是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一位杰出的英国清教徒神学家。他为如何过上虔诚的生活撰写了详尽并实用的指南。如果巴克斯特认为获取身外之物只是上帝虔诚信徒的一个小小的责任，那么他的著作表明，基督徒如何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他们的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责任。巴克斯特是韦伯归于新教，特别是17世纪加尔文主义的，将冲动理性和系统化的典型作家。他的这本名为《基督教经济学》（或称《家庭责任》）（*Christian Economics (or, Family Duties)*）^[20]的著作有504页，其标题为早期新教徒“经济”改革做出的努力的重点和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并展示了他所认为的基督教经济学和基督教家庭生活的直截了当的等价关系。巴克斯特也在这本书中详细讨论了基督教徒的经济生活。

巴克斯特的论文只是现存的很多本16到18世纪新教家庭手册和家庭目录中的一本。^[21] 这些未经研究的文本表明，就新教徒确实有助于塑造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而言，他们首先是通过使家庭（*oikos*）合理化，来教授其成员职业、纪律和努力工作的意义与衡量标准。的确，资本主义的诞生不仅取决于将行会和教会的垄断重组为高度合理的工厂和具有竞争性的供求市场，更基本的是取决于家庭的彻底合理化——一个许多新教徒所认为的，在社会、政治和神学上优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制度，包括经济。家庭手册教导了虔诚的基督徒如何管理夫妻、父母与子女以及主人与仆人的权利和

^[19]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pp. 181-82.

^[20] Baxter, *A Christian Directory: or, A Summ of Practical Theologie, and Cases of Conscience: Directing Christians, How to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Faith; How to Improve all Helps and Means, and to Perform all Duties; How to Overcome Temptations, and to Escape or Mortifie Every Sin*, 2d ed., 4 parts in 5 vols. London 1678.

^[21] 对于有早期天主教和后来自由形式的家庭手册，见 John Witte, Jr. and Heather M. Good, *The Duties of Love: The Vocation of the Child in the Household Manual Tradition*, in Patrick M. Brennan, ed., *The Vocation of the Child*, Grand Rapids, 2008, pp. 266-94.

责任：它们提供了从餐桌礼仪到衣着、饮食、工作习惯、礼拜和祷告的一切参考，教导了父母怎样在孩子身上培养美德及如何与恶习作斗争，劝诫了孩子们要听从长辈的教导（或忍受长辈的责骂），并在年老时照顾长辈；这些手册们劝诫父母与孩子、主人与仆人共同养成有秩序、有纪律的习惯，使每个人都能在他们独特的基督教职业中做好工作，知道努力工作是上帝恩惠的反映和肯定。

这些家庭手册都证实并限定了韦伯对市场、道德和性格形成这三点之间联系的一些重要见解。韦伯和后来韦伯式的关于经济合理化的论述都集中于“公共”经济——手艺人、商人和商人、买方和卖方以及那些在市场上制造、交换、出售和购买商品以及服务的人的生产活动及态度。从事以上这类活动的早期现代新教徒或许在不同程度上被韦伯所强调的宗教动机、信仰、基督教职业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所培养的良好工作和道德规范影响。然而，值得强调的是，早期现代新教徒的职业观念不限于一个人的职业和公共事业：父亲身份、母亲身份和个人童年都被早期新教徒认为是与铁匠、面包师、银行家或律师一样重要的职业。此外，早期现代欧洲和北美大量的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家庭通常包括佣人、学徒、学生以及血亲，提供了大量的抚育、教育、社会福利和道德规范），这些活动——历史上是由中世纪天主教堂，现代是由拥有现代福利体制的国家，；每个家庭成员在这种精心安排的家庭领域中学习到的规范和习惯，组成了他们为公共经济生活所做准备的重要部分。由此看来，早期现代新教徒家庭的合理化，是大西洋两岸社会后期制度分化逐步实现早期现代经济合理化的重要环节。

来自新教徒家庭手册的例证

这里，我以四个新教家庭手册作家为例：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罗伯特·克里弗（Robert Cleaver），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和巴克斯特（Baxter）。这四位作家都将他们的手册建立在圣经、古典、爱国和人文学习上。他们的语言都非常通俗易懂，所有虔诚的人都能通过阅读或聆听他们的指导来了解他们。他们都是大英帝国、欧洲大陆以及后来北美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再版，并且被翻译成很多语言。

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1575）。苏黎世改革者海因里希·布林格的作品是早期新教家庭手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写的关于家庭的作品消除了路德教（Lutheran）、加尔文主义（Calvinist）和圣公会（Anglican）之间的鸿沟。布林格的《基督教婚姻金皮书》（*The Golde Boke of Christen Matrimonye*）（1540）以德语写成，

并由著名的圣经翻译家迈尔斯·科弗代尔 (Miles Coverdale)^[22] 翻译成英文。这本书在教会、国家和工作场所等契约社区的基础上建立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契约模式。他写道，“婚姻是一个契约，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双方同意下的结合。” “神圣的婚姻是上帝在天堂里指定的。”因此，它“光荣且神圣”，由《圣经》中“最神圣、最具有美德、最具有智慧和最高尚的人”所享有；所有的人——无论是牧师还是世俗的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单身或是丧偶的人，有钱的或是贫困的人都应享有。对于布林格来说，单身的成年男女没有结婚就同居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23]

上帝创造婚姻，使一男一女“可以彼此诚实友好地生活在一起，避免不洁，在婚姻中，夫妻可以相互帮助和安慰对方，并教育孩子让孩子对上帝心存敬畏”。布林格基于传统新教徒关于婚姻保护夫妻不受色欲影响和生儿育女养育后代的目的进一步阐明：婚姻是上帝“给我们软弱且无能肉体的良药”，子女是婚姻中“最大的财富”。至于夫妻之间的爱和友谊，布林格则认为，“婚姻中的爱（除对上帝的爱以外）应当高于一切其他的爱”，夫妻之间应当互相给予对方“最好的扶持和最辛勤、最热忱的劳动……相互服务、渴望、依赖、帮助和宽容对方，共同渡过磨难，体验喜悦和忍受痛苦”。婚姻家庭是为成年人提供社会福利的主要机构，是亲属关系的中枢神经，它对人类的繁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书中，布林格详细地阐述了夫妻对彼此的责任。^[24]

有孩子的夫妻可以在布林格的《金皮书》 (*GoIde-Boke*) 中找到对父母责任的充分指导，这些责任包括了对孩子母乳喂养、养育、保护、管教、教育和着装，以及孩子未来求偶和与合适的伴侣订婚等。布林格关于纪律和培养的评论是十六世纪家庭手册的典型代表。他从一开始就鼓励父母让孩子接受“虔诚、诚实、严肃和富有成效”的教育，并为其树立类似榜样。父母应该言传身教所有这些基本美德，引导小孩记住和背诵十诫、使徒信条以及福音书和书信中其他恰当的经文。他们应该教育自己的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有益的事情上，不要无所事事”，也不要偷盗、打架、讲八卦、伤害自己或他人。当孩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父母应该“适当、谨慎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害怕和敬畏那些错误；如果言语无法教导他们，就谨慎采取棍棒，因为惩戒之杖使人有智慧”。^[25]

^[22] Heinrich Bullinger, *Der christlich Eestand*, Zurich 1540, 译为 *The Christen State of Matrimonye*, London, 1541) (STC 4045) 又译为 *The Golde Boke of Christen Matrimonye*, London, 1542) (STC 1723) under Thomas Becon's pseudonym, Theodore Basille.

^[23] Bullinger, *The Golde Boke*, folios pp. i.b–ii, iii, v, xxi.b, xxiii, xxxvi.b, lxxvii.b–lxxviii.

^[24] 同上, folios pp. iii.b–iii; iv–v.b; xix; xxi.b; xxii–xxiii; xxxvi.b–xxxviii; Heinrich Bullinger, *Decades of Henry Bullinger: The First and Second Decades*, ed. Thomas Harding, Cambridge, 1849, pp. 397–98.

^[25] Bullinger, *The Golde Boke*, 同上 lxxii.b.

布林格还鼓励父母通过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来决定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鼓励父母帮助孩子培养勤奋的好习惯。布林格曾说，父母教导孩子识字和认识数字，或是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结婚，虽然重要，却是远远不够的。小孩需要充分的职业准备、父母的鼓励和钱财，才能在职业中有所成就。没有给孩子提供并强调适当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父母，实际上“毁掉了自己、小孩、联邦和会众”。其中，联邦和会众需要训练有素的领导和臣民，需要他们不仅精通“上帝的法律、先知的预言和福音”，而且拥有使他们在行业里成功的手段和条件。“纷争、残忍的迫害、暴政、使臣民不公正的法律、假宗教、不道德的教义、亵渎神明的律例典章都来源于无知统治者的盲目和愚昧，来源于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被暴君蹂躏或被无能的官员虐待时，不能适当地自力更生或相互支持。”^[26]

布林格将以上对职业的全新理解与更广泛的经济改革联系起来，呼吁人们为教会官僚机构的核心服务建立一个职业培训和使教育普及的体系，从而取代中世纪教会的教育体系。“在过去，当人们看到富有的主教、牧师、执事、修道士、隐士、总理等人物获得精神升迁时，他们会让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以期成为无用的天主教教士（*popish priest*）^[27]——无所事事地靠别人辛勤劳动来养活。”随着16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布林格进一步阐述道，教士对于世俗的人的剥削结束了。现在，“所有联邦州和会众的公共财产、劳动和虔敬取决于”所有公民和被领导的臣民在适合他们的好的学校里接受远远超出教会教育范围的各种各样的职业教导。“现在，基督徒的父母啊，既然你们的青春因为上帝的恩惠充满了智慧，就不要白白浪费上帝赐予你们的恩典和礼物，要好好锻炼并使用它”，以使你们的孩子“为自己的联邦谋利益”。的确，父母应当在孩子年幼时在家里训练他们，等他们稍微年长时再让老师和主人教导他们，让他们正确学习和“公正地从事于所有公正和正当的职业”，并让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在自己的天职里辛勤劳动”，那么“上帝的祝福就会让他们繁荣昌盛”。^[28]

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的牧师托马斯·贝肯（Thomas Becon）于1542年发表了一版布林格的小册子（*Bullinger's tract*），这本小册子在今后被定期重印和使用。贝肯为这本1542年的小册子写了长篇序言，并在其中称赞道，婚姻家庭不仅是为了夫妻和小孩的精神健康，也是为了联邦和教会的公民利益。他大肆吹嘘地写道，“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婚姻家庭中，我们有机会得到宝贵的珍宝，我们的美德得以保持，恶习得以避免，房屋得以补充，城市得以居住，土地得以耕种，科学得以实践，王国得以繁荣，友好得以保存，公共财富得以捍卫，自然继承得以延续，美好的艺术得以

^[26] 同上, folio pp. lxxii.b.

^[27] 贬义词，多被新教徒用来形容教皇和罗马天主教相关的事宜

^[28] 同上, folios pp. lxxiii-lxxiii.b.

传承，良好的秩序得以保持，基督教世界得以扩大，上帝的话语和荣耀得于广阔传播。”的确，英联邦的安全和成功完全依靠于“家庭的稳定和繁荣”。^[29]

罗伯特·克里弗 (Robert Cleaver) (约 1561 年)。个人婚姻家庭的公共效益和价值，是罗伯特·克里弗的巨著《家庭管理的神圣形式》(*Godly Form of Householde Gournment*) (1598) 的中心主题。^[30] 克利弗是牛津郡的一位清教徒传教士，他写了一些关于十诫、安息日和基督教虔诚其他方面的短文。在《家庭管理的神圣形式》一书中，克里弗努力使家庭生活系统化和合理化，扩展了布林格所阐述的主题。克里弗写道，“所有形式的家庭管理都必须以两个主要目的为导向”，“第一个是基督教的圣洁，第二个是今生所有相关事宜”；“基督教家庭必须有宗教；好的管理形式会把虔诚的行为、节俭的习惯和良好的畜牧业带进家庭。”^[31]

克里弗相信，男性家长必须在“家庭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一个丈夫，他必须“谨慎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必须像耶稣支持和爱他的教会一样“珍惜和呵护”她；他必须“仁爱、诚实、清醒和贞洁”地与她共事。同时，他也必须“以知识、智慧、判断和正义在所有有关婚姻状态的事宜中管理她”，丈夫不能“恨，凶，狠”地对待妻子；即使作为她的领导者，也永远不能“打她”，但是要责备和告诫她。反之，“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必须“通过树立好的榜样和给她好的指示来启发她”。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在家庭内的每日祷告、问答、阅读圣经，在个人奉献中领导他的家人；他必须确保小孩和仆人在公共礼拜和安息日保持虔诚；他必须谨慎地为孩子们提供有智慧的指导和告诫，并给予耐心的惩罚和责备。^[32]

相对于丈夫管理家庭的责任，妻子的责任则是对丈夫“忠诚且充满爱意”，并“明理且谨慎”地对待家庭。她必须按照圣经所吩咐的那样，“尊敬她的丈夫”并“臣服于他”；她必须按照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恰当地处事并合适地打扮自己和孩子；她必须避免懒惰，避免选择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朋友；她必须节俭、公正、仁慈、并在选择朋友时谨慎；她必须维持秩序并且帮助维持“家庭内的宗教活动”；她必须特别照顾她的女儿和其他少女，教育她们，并为她们树立作为基督教妇女的规范和习惯。^[33]

^[29] 同上, Aiiii.

^[30] “家庭政府”即 household government, 源自 16 世纪晚期，最早由克利弗开始使用。因原作者用的是单数“government”而不是复数“governments”，相比于表示一种“每个家庭单独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政治体系”，原文更接近于“管理或治理家庭的行为、做法、或制度”。

^[31] Robert Cleaver, *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e Gournment*, London, 1598, pp. 6–7. John Dod and Robert Cleaver, *A Plaine and Familiar Exposition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with a Methodicall Short Catechisme, Containing Briefly all the Principall Grounds of Christian Religion*, London 1604, 181 (STC 6968).

^[32] 同上, 24, pp. 226–228; Cleaver, *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e Gournment*, pp. 92, 114, 159ff., 202ff.

^[33] 同上, pp. 52–91, 203–222; Dod and Cleaver, *Plaine and Familiar Exposition*, PP. 221–222.

夫妻对彼此和对孩子都有责任。他们“必须以一颗纯洁的心热烈地爱对方”；他们必须对彼此“忠诚”，并不断地“尽一切努力互相帮助，共同为家庭谋取利益”。他们必须一起祈祷，“互相劝诫”，并“在彼此的救赎和对上帝的侍奉上互相帮助”；他们必须一起“从摇篮里就教导孩子敬畏上帝、憎恶恶行、谦逊，并热爱美德”，因为这些美德最终将会被带出家门，并被应用到更广阔的经济层面上。随着孩子的成熟，父母必须“让孩子选择并从事合法的、对他们有好处的天职，使他们能够诚实地像基督般地生活，而不是成为对地球和联邦毫无用处的负担”。他们还必须为孩子“准备嫁妆或聘礼”，在他们恋爱时向他们提供咨询，并在他们到了适当年龄和谨慎地选择好了结婚对象后同意他们结婚。相对于父母的责任，“小孩的责任”则非常简单，他们要“尊敬、服从和感激”父母；^[34] 这些责任集中体现在孩子寻求父母同意自己的婚姻，并在父母年老或残疾时照顾他们。

在许多家庭中，男人和女人分别是仆人和学徒的“男女主人”——这些仆人和学徒为家里工作，有时住在家里，是家庭日常商业和生活的一部分。克利弗视这样的主仆关系为亲子关系的一种自然和必要的延伸。男女主人必须教他们的仆人遵守纪律和辛勤劳动，以防他们懒惰。主人必须培养仆人，使他们变得“诚实、有礼貌、有道德”。同时，主人也必须像父母教导自己的小孩一样，不“狡诈、欺骗、拖延或隐瞒地指导仆人和学徒学习相关职业和贸易知识”；他们也必须“像慈爱的父母对待自己亲爱的孩子一样”，“谨慎的、怜悯的以希望他们改正错误的态度”来教育他们。同时，他们也要在小孩和仆人之间维护纪律、礼仪、尊重、勤奋以及和睦，并努力“将罪恶和腐败的宗教驱逐出他们的住所”。^[35]

克里弗曾说，家庭不仅是基督教道德的孵化器，也是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商业模式。例如，在雇佣仆人和学徒时，主人在确信仆人和学徒的技能、长处和他们如何从精湛的技艺或工作中获利时，也必须对他们“诚实、虔诚的谈吐和他们如何从信奉上帝中获利”有所把握，因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跟随上帝的仆人，比起不信教的仆人，更容易兴旺发达。”一旦雇了仆人，主人就有责任在照顾仆人身体的同时照顾他们的灵魂。的确，主人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商业中都要履行耶稣的三种职能^[36]：“为了展示一个虔诚的人如何在家中和工作中表现得体，主人应当像国王一样统治、像先知一样教导、像牧师一样祈祷。”除了这种精神上的领导，主人也必须制定规则和创造工作条件，为仆

^[34] Cleaver, *Householde Gouernment*, pp. 188–191, 243ff.; Dod and Cleaver, *Plaine and Familiar Exposition*, 174–222.

^[35] 对于主人和仆人的章节，请见 *A Godlie Forme of Hovseholde Government: For the Ordering of Private Families According to the Direction of God's Word*, London, 1600, pp. 363-83.

^[36] “耶稣的三种职能”是一种基于旧约的基督教条，基督徒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教条指出，耶稣在人间传道时行使了三种职责：先知、牧师、国王。

人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住所，奖励他辛勤的劳动，支付公平的工资，保持合理的工作时间，并给予所有人每周的安息日。一方面，他必须在合法获得财产和适当积累财富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平衡“挥霍”和“吝啬”。他必须促进工人之间的合作，同时，自己也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以便“工人们必要的事务和业务得到良好的调度”。仆人、工人和学徒则必须“从内心愉快并自愿地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如同韦伯所认为的，繁忙的工作能减轻精神上的焦虑。克里弗敦促工人“认真完成所有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并最终认识到：“自己是为上帝，而不是为其他人而服务的；自己因此不仅会得到世俗的回报，也会得到与劳动成正来自自主的报偿。”^[37]

如同早期手册主义作者托马斯·贝肯所认为的，克里弗坚持道，忠实地维护所有家庭责任和家庭管理机制是教会和国家维护生产秩序的最佳保障。的确，正常运转的家庭对国家繁荣昌盛必不可少，因为“如果家长不在家保持纪律和学习经文，不向治安官和 大臣伸出援助之手”，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快就会被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所取代。一个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家、不懂得自律的人是不可能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这样一个不懂法治的人也因此不配统治”。^[38]

以上所诉是克利弗英国神职同胞所相信的传统观点。罗伯特·皮克（Robert Pricke）坚持认为，“当人们尊重家庭事宜并认真履行家庭责任时，任何家庭、教会或联邦都不会发生混乱和骚动”，因为家庭责任和纪律让人们“了解到了主耶和华的知识，并赋予与主神圣威严相应的尊敬和荣誉”。同时，这些责任和纪律还教导了人们“维护和延续共和国所有这些不动产和法令”的个人美德和公民习惯。^[39]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gers）进一步写道，一个稳定的家庭是“上帝的好助手，是法律、州、法令、政府部门、赠予礼物和公共服务的支持者，是和平的荣耀，是国家、城市、大学……和王国的基础”。^[40]清教徒牧师，威廉·古奇（William Gouge）在他由 8 卷，总共 800 页组成的巨著——《家庭责任论》（*Domestic Duties*）（1622）中也写道，“自觉履行家务的行为……应当被当作为社会做贡献”，因为“在家庭中表现良好的成员更有可能成为教会和联邦的好成员”。^[41]

^[37] 同上, pp.372-73, 378-83.

^[38] 同上, 引言, A4; pp. 4-5.

^[39] Robert Pricke, *The Doctrine of Superioritie, and of Subjection, contained in the Fifth Commandment of the Holy Law of Almighty God*, London pp. 1609, B2.

^[40] Daniel Rogers, *Matrimoniall Honour or, The Mutuall Crowne and Comfort of Godly, Loyall, and Chaste Marriage*, London 1642, pp. 17.

^[41] William Gouge, *Of Domesticall Duties: Eight Treatises*, London ca. 1622) (STC 12119), pp. 17, 27.

古奇在他的书中主要讨论了主仆关系，并用 100 多页的篇幅描述了他们各自的职责。与克利弗一样，古奇让家长在家中充当“先知、祭司和国王”的角色，并认为他们应当培养仆人和学徒的灵魂、思想和身体：

家长们通过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通过让仆人更加忠实地服侍自己，让自己受益颇多，因为没有什么办法能如仆人心中对神的敬畏一样有效地激励他们做善事。仆人如果率先得到主的恩典或是依靠主人的钱财进一步得到主的恩宠，就会对主人心存感激，并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报答主人。因此，仆人会尽其所能来感恩他的主人：他不仅会尽忠职守、勤勉工作，还会祈祷神能让自己的主人时运亨通……所有仆人中，虔诚的仆人是有可能对家庭、联邦和教会有益的。^[42]

古奇（Gouge）相信，经过如此训练的仆人也因此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天职”或“职业”。“神藉着他的旨意，使人的事务井然有序，所以，那些不时派遣和培养了许多受过良好训练和娴熟技艺的学徒的家长，能够持续增加自己的交易和利益；同时，学徒也能进步……以上即是使每个人都能更加勤奋和忠诚的一种特殊手段。因为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时，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必须对自己、同伴、主人、家庭和引导他们选择此职业的上帝给出一个交代。”^[43]

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另一位英国清教徒威廉·珀金斯，对“基督教职业”这个话题也格外关注。他是剑桥基督学院（Christ College, Cambridge）的院士，也是剑桥圣安德鲁教堂（St. Andrew's Church）的牧师。珀金斯写过一篇著名的关于职业的论文（*Treatise of the Vocations*），这篇论文在他死后于 1605 年发表。珀金斯对于井井有条的家庭的描述同克利弗和布林格的阐述相似。珀金斯宣称，“婚姻是上帝亲自创造并指定为联邦和教会中所有生命的基础和学习神旨的地方”；“那些履行对上帝的服务的家庭不光是小小的教堂，同时也是人间天堂。”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基督教家庭里，对上帝的崇拜必须排在第一位，因为崇拜上帝的同时也巩固了所有家庭关系、责任和活动。“常识和通畅的逻辑表明，侍奉上帝的同时也是一项必要的义务，因为家庭的幸福和繁荣完全依赖于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而上帝的祝福与人们对他的崇拜和信赖密不可分；家庭的幸福和繁荣表现在夫妻之间相互关爱、子女对父母孝顺、仆人对主人忠诚服务上。”像克利弗一样，珀金斯强调说，父母作为家长对孩子和仆人的责任不仅仅是爱护、养育、喂养他们，给他们穿衣和保护他们免受苦难，父母也要“观察孩子的天赋和兴趣爱好，并相应的因材施教，以此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天职使命”。^[44]

^[42] 同上, bk. 8, pp. 21, 现代印刷版, William Gouge, *Of Domestic Duties*, ed. Greg Fox, Pensacola, FL 2006, pp. 484.

^[43] 同上, pp. 495-96.

^[44] William Perkins, *Economy, or Household-Government: A Short Survey of the Right Manner of Erecting and Ordering a Family,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in THE WORKES OF THAT FAMOUS AND WORTHY MINISTER OF

珀金斯集中讨论了社会中所有成员的“天职使命”。他写道：“不论其地位、国家、性别或状况，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必须有专属于他的、私人的天职。”为了这个天职，他必须勤勉、热诚地工作，为神、邻舍、教会、国家、家庭和自我的荣耀与尊严而努力。

“懒惰和玩忽职守是对上帝在人类社会、教会和联邦建立起的良好秩序的一种破坏。无可置辩，懒惰和怠慢是许多罪过的根源。正如懒散的身体和懒散的大脑是魔鬼的作坊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摆脱精神上的困倦”，并时刻准备问自己“我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或我是否敬畏了上帝？”^[45]

珀金斯把反映这一职业理想的圣经和古典诗句集合在了一起，把矛头直指那些在他看来背叛了这一理想的人。他把这些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游手好闲的闲汉和酒鬼、流动的流浪汉和乞丐，还有那些利用别人善意的人。珀金斯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不值得同情的穷人”。他们应该努力工作，重建被他们掏空的慈善金和救济金，以便这些财务能够适当地服务于“理应受到帮助的穷人”——即，寡妇、孤儿、伤者和残疾人。第二类人是“闲散的富人”，他们继承或获得了“巨大的财产和收入，把他们的时间花在吃喝玩乐和消遣上，而不是用于为教会或联邦服务”。珀金斯引用经文指出：那些收益颇多的人，也应当以相同数目回馈给施者；而那些有财富或闲暇时间的人，则有义务为他人提供机会，增进共同利益。第三类人也是相对于职业理想最离谱的背叛者——是“僧侣与修士”和其他所有“教会仰慕者”，这些人“在禁食和祈祷中远离社会”。“僧侣的这种生活是可恶的”，珀金斯写道，因为它用懒惰和无所事事伪装成一种宗教职业。事实上，“所有僧侣都是盗贼和强盗”；因为他们依靠别人的劳动和收成来生活，所以他们不是“社会或组织品行良好的成员”。^[46]

“每个人都必须意识到，上帝为他安排的天职是最适合他的。这并不是说这个职业是所有职业中最好的，而是对他个体最好的。”因此，每个基督徒都至少要“在工作中努力完成他的个人使命，并同时实现他作为基督徒与其他所有基督徒的共同使命……在完成他个人使命的中，他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珀金斯说，一个人的职业必须适合他的爱好和天赋，在这方面，信奉基督教的父母和主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必须关注孩子的兴趣爱好，让小孩的教育和训练符合他们的天性：“有些小孩喜欢音乐，有些喜欢经商，而有些更适合从事自由职业”；“那些在身体劳动上表现出色的孩子应当从事体力劳动，而那些头脑很聪明的孩子，应当从事依靠智慧和学习的科学领

CHRIST IN THE UNIVERSITIE OF CAMBRIDGE, M.W. Perkins, London, 1631), pp. 3:418–419, 669, 695. 同上, 3:695.

^[45] William Perkins, *A Treatise of the Vocations*, in WORKES, pp.1:750-779, using modernized edition of William Gross (2015) (digitalpuritan.net), pp. 9, 13, 17-18, 50.

^[46] 同上, pp. 13, 16-17.

域。”珀金斯认为，父母未能鼓励和培养孩子从事适合他们的职业“是一种普遍而巨大的罪恶”：

大多数人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可以活下去，却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活得好，或者他们是否在适合自己的天职中侍奉上帝。而事实上，父母对子女和人类社会所做的最糟糕的错事，就是让孩子去从事不适合他们的天职——比如让一个适合学习的孩子去做生意或是去从事体力劳动；反之，让一个适合做生意的孩子去学习。这就好比人用脚趾头，而不是用手指去接触事物，用手而不是脚走路，并将身体各个部位移到不适合它们的位置。^[47]

珀金斯用身体及其各个部分作比喻进一步论证了，当一个人从事最适合他天赋的职业时，他必须遵守这个职业的规矩——“他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这个职业的极限或范围内。”就像一个身体需要它的各个部位充分行使各自的职责才能正常运转，或是一支军队需要每个士兵服从命令一样，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和经济体制需要工人遵守规矩。如果一个人遵循他的天职，他就会被祝福，整个社会都将与他同在；如果他“背离了他的天职的指引，他就会离神的道路越来越远，并因此失去全能的主对他的保护，在上帝的惩罚和灾难面前变得无能为力”。^[48]

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991）。清教徒传教士巴克斯特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说，基督教职业和有序的基督教家庭是教会、国家、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基础。马克斯·韦伯也曾用来例证早期现代具有新教精神的资本主义。巴克斯特是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和伦敦（London）一位受欢迎的传教士，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留下了大约 168 本书。他那本 500 页的关于《基督教经济学》（或《家庭责任》）的大部头著作（*Christian Economics (or Family Duties)*），^[49]不过是他的广为流传的清教徒道德神学手册中的四本巨著之一。虽然《基督教经济学》这本书在这四本合集中占有指导意义的地位，但是巴克斯特却把它放在第二位，排在一本关于《基督教伦理》（或《私人责任》）（*Christian Ethics (or Private Duties)*）的书之后，两本关于《基督教传道》（或《教会责任》）（*Christian Ecclesiastics (or, Church Duties)*）和《基督教政治》（或《对我们的统治者和邻居的责任》）（*Christian Politics (or, Duties to Our Rulers and Neighbors)*）的书之前。这个排列顺序凸显了巴克斯特的观念，即：家庭的经济责任是私人美德和公共美德之间的关键支点，也是教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准备和试验场。

^[47] 同上, pp. 14-19.

^[48] 同上, pp.8.

^[49] 再版为 Richard Baxter, *A Christian Directory, or, a Body of Practical Divinity and Cases of Conscience*, 5 vols., London 1825.

马克斯·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其他很多小册子里强调了巴克斯特的“禁欲主义”清教徒伦理。作为典型的早期现代清教徒手册作家，巴克斯特坚持认为：纪律凌驾于松懈，朴素凌驾于奢华，节俭凌驾于浪费，勤劳凌驾于懒惰，效率凌驾于怠慢，追求上帝赋予自己使命的祭司好于奢侈、懒惰、从而损害所有人经济发展的牧师。韦伯认为，这种清教伦理有助于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引用巴克斯特的话写道，“有职业使命感的工人会有序地工作，其他人则会陷入持续混乱的境地，这些人的生意将会无法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营。”^[50]

禁欲主义道德观显然是巴克斯特世界观的一部分，他在冗长到令人目眩神摇的散文中阐述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但值得强调的是，巴克斯特将这种禁欲主义伦理观视为“家庭责任”的产物和其中的组成部分，他在《基督教经济学》一书中也对这一点作了详尽的阐述。就像布林格、克里弗、珀金斯和他之前一个世纪的新教手册作者们一样，巴克斯特相信，这些良好的工作习惯和经济美德首先是在有秩序的婚姻家庭中养成的：在这个家庭里，夫妻、父母和孩子、主人和仆人都要学会对彼此和周围的人履行他们的基督教职责。巴克斯特相信，“神圣家庭”是教会、国家和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第一个学校和神学院，第一个教堂和联邦，第一个车间和零售商。他写道，“神圣的家庭管理机制，是上帝用来统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一个圣洁和管理良好的教会做准备”；它使国家和联邦幸福快乐，让经济和社会蓬勃发展。。的确，小孩或仆人在有秩序的家庭中接受的“良好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使他们成为好的治安官和好的臣民的最至关重要的途径，因为良好的教育往往会让他们成为好人”。因此，巴克斯特告诫父母和男女主人，要“培养你的孩子一生辛勤劳动，不要让他们在年幼时贪图享乐和无所事事。社会上的流浪乞讨者和太多的绅士们就是这样彻底地毁掉了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她们没有天职使命感，不工作，但却成天装扮享乐和游玩，而事实上，她们的娱乐时间应该只是所有时间的一小部分；因此，由于父母的过错，她们过上了无所事事的生活”。父母最好是为孩子“选择适合他们，最有可能拯救他们灵魂及对国家和教会有用的人生轨迹和天职”。^[51]

巴克斯特坚持认为，“家庭照管和政府的主要责任不仅包括对自己子女的正确教育，还包括对仆人甚至奴隶的正确教育。”“仆人是家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对家庭的圣洁与否，以及家庭的幸福与否都有很大的贡献。因此，主人理应谨慎选择他们的仆人。”巴克斯特认为，在许多特点中，一个好的仆人要有“力量、技能和愿意工作的意愿”，不能“懒散、放荡和追求肉体享受”；一个好的仆人要“敬畏上帝，或者至少要

^[50] Weber, *Spirit of Capitalism*, pp. 103–09. See further Baxter, *Christian Ethics (or Private Duties)*, chap. 3, Grand Directive 10.

^[51] Baxter, *Christian Economics (or Family Duties)*, pp. 66–74, 97–105, 186–89.

温顺和愿意被教导”，而不是“不敬虔上帝、追求感官享受和亵渎神灵”，因为那样他就会危害家庭，不认真工作，从生意中偷窃，把别人引入歧途。的确，“不虔诚的”、“沉迷肉欲享受”和“邈邈的仆人”缺乏纪律、荣誉和秩序。他们只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工作需要做的事；他们会很晚才开始工作，很早就离开；他们会放纵自己的胃口，而不是专注于生产力和效率；他们遵循自己的旨意，而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主人的旨意，更不是同伴的意愿。巴克斯特相信，这些仆人必须被“赶出”工作、家庭和商铺，然后让品行更好的人取代他们，即使那些人还没有接受良好的训练。^[52]

巴克斯特坚持认为，那些符合并保持高道德标准的仆人必须受到良好的对待，并且必须始终如一地接受关于艰苦工作和纪律的价值观教育。“仆人是否幸福，他的灵魂是否安全，生活是否舒适，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家庭。”男女主人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仆人当作基督徒同伴，而不是负担。他们必须根据仆人的职业技能，给予仆人积极、有难度且有意义的工作，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和成就给予奖励和升迁。男女主人同时也必须提供体面的食物和住所。他们必须培养仆人们有道德、做基督礼拜和虔诚的习惯，并让他们坚持正确使用安息日。主人必须惩罚罪恶的行为，鼓励并维持基督教纪律，把好仆人和坏仆人分开。同时，主人也必须为基督徒树立正直、有智慧和有耐心的榜样，并为他们提供达到这些标准的条件。^[53]

总结和结论

以上已经抽样的新教家庭手册规定了一种家庭合理化与程序化的形式，这对早期现代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教徒的家是一个小小的，能够提供教育、养育、社会福利和道德纪律的国家，这些福利在历史上更多是由中世纪天主教会，在现代，则由拥有现代福利机构的国家所提供。新教徒的家也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家庭农场、商铺、地产或服务行业，给予仆人和劳工在基督徒主人的领导下学习谋生手艺的时间和空间。新教徒的家也是一所小学校，在那里，小孩和学徒们被教导和被规范行为去从事最适合他们爱好和天赋的职业，并学会从这一职业中脱颖而出，从而尽到对上帝、邻居和自己的责任。

就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的著名论证一样，这些家庭手册的真正影响难以被精确量化。许多学者质疑韦伯的主张——新教的理想和焦虑在现代经济的起源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学者说，如果神学对这一转变有任何影响，这个影响也次于科技、法律和政治的创新。类似地，韦伯之后的社会学家也表明，早期现代家庭是培养市场道德规范的许多新机构之一，尤其是文艺复兴和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公立学校。而且，每

^[52] 同上, pp. 40–44, 155.

^[53] 同上, pp.43, 209–11.

一个新教家庭是否遵守这些手册中提出的理想也让人十分怀疑。这些手册的广泛使用反而可能表明，正是因为新教徒经常违反这些规范，所以这些道德标准才需要不断地被强调。

尽管有以上那些不同意见，抽样的那些家庭手册至少也起到了解释作用，清楚地说明了韦伯归因于早期现代新教的合理化冲动类型——那些类型代表了这种冲动所采取制度形式的手段之一。新教徒将普通工作提升为神圣“天职”的事实，改变了重要经济角色和经济关系的社会和宗教地位，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彻底地重新诠释了普通人在实践中如何履行这些角色和关系。那些家庭手册为普通读者而写，为他们定义了家庭经济的尺度和界限，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详细、可伸缩、有组织层次的结构模型。它们为个人、家庭和更广泛社区的健康提供了职业道德、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论据：勤勉、自律、节俭和相互照顾是神圣的职责，而懒惰和挥霍则是邪恶的恶习。因此，这些家庭手册力求细致安排家庭生活及其组成的经济和价值。正是因为人们执行了家庭手册中的指令，家庭才能推动经济转型的浪潮，席卷近代初期整个新教徒的土地。虽然新教家庭本身并不能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理由，但是它仍然是那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